

[DOI]10.19649/j.cnki.cn22-1009/d.2020.04.020

当代中国卫生防疫体系建设及其经验

张林鹏^{1,2}

(1.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 100006;2.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要当代中国卫生防疫体系是在战争、贫困和疫病的困扰下逐渐起步的。面对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薄弱卫生工作基础,在毛泽东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部署和领导下,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初步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防疫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卫生防疫体系逐步在完善,并且经历了从单一的卫生防疫向全面的疾病防控,再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两次较为明显的演变。经过七十多年的建设,我们科学防疫精神的实践理性得到发扬,取得丰富的经验,使我们的卫生防疫体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实质作用。

关键词爱国卫生运动;卫生防疫体系;人民健康;健康中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20)04-0133-07

健康是生产力。^[1]重视和发展健康生产力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基本体现。消除贫困和疫病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透过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尤其是对健康生产力的重视,来看中国的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完善和发展,能够解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在取得了经济建设伟大成就的同时,相继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卫生防疫体系。另外,通过对中国卫生防疫体系不断完善的历史分析,讲明白我们的卫生防疫体系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演变,如今能够在科学理性的层面立住脚,并且在面对未知流行病时能够起到实质性的科学防控作用。

一、新中国卫生防疫体系的创建与完善

战争、贫困和疫病束缚了旧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也对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体系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建设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在长时间的战争之后面对的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不光是工农业生产落后,就是人们的身体健康也受到疫病威胁。据统计,当时“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血吸虫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2]38}。面对这样薄弱的防疫基础,在毛泽东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部署和领导下,全国上下攻坚克难,建立国家卫生行政组织,团结最广大医务卫生人员,推动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防疫专业机构的建立与发展,利用国家科技规划促进卫生防疫科技发展,最终初步创建了国家卫生防疫体系,有力地捍卫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安全。

[收稿日期]2020-03-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2015MZD009);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手工业的演变对其产业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研究”(17BJL028)。

[作者简介]张林鹏(1990-),男,历史学博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后。

(一)建立国家卫生行政组织

中国共产党有着通过成立卫生行政组织来应对流行疫病的传统。1931年,苏区临时政府设立卫生局来统管卫生工作。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3]1040}将发展卫生事业纳入到新生政府的工作中。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18条规定:在政务院下设立卫生部。同年11月1日,卫生部正式成立。12月,全国各大行政区都相继设立了卫生行政组织。1950年秋,周恩来在《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中指出:“在过去一年内,人民政府已经大规模地开展了反对疫病的斗争。人民政府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在每个县和区建立起卫生工作机关,以便改进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健康不良状况。”^{[4]49}

根据中央的这些政策和指示,中国各级政府均设有卫生厅(局),其内部都建立了卫生防疫处,为人民防疫工作服务。除此以外,为了加强对“流行最严重,危害最剧烈,流行因素复杂,防治工作艰巨,涉及部门多、地区广的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力度,党和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卫生防疫领导机构。最典型的是1955年前后设立的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这些举措奠定了我国卫生防疫体系最初的组织框架基础。

(二)团结最广大医护卫生人员

刚结束战乱的新中国,早期的卫生防疫体系仍然以消除广泛威胁国民健康的传染病和地方性疾病为主要目标,而此时的经济力量和医护人员储备并不允许大办医院。因此,这一时期的卫生防疫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医护卫生人员,以此来壮大卫生防疫力量。1950年8月,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5]493}

1951年9月7日,贺诚在给中央关于全国防疫工作的报告中,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工作遵循“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项原则取得的成绩和工作中还存在的缺点。报告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在以中央名义起草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6]176}从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医护力量就成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体系建设中一直坚持的一项基本工作。

(三)开展爱国防疫卫生运动

1952年2月抗美援朝战争正呈胶着状态时,美国发动了细菌战争,引爆了朝鲜战场的鼠疫、霍乱等疫情,到3月份就有志愿军战士患病死亡。面对严峻的疫病防控形势,我国开展了反对细菌战,努力防控疫病的斗争。毛泽东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7]614}随后,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对于疫病的防控,逐渐上升到保家卫国的政治高度。

第一,扑灭前线疫病。为了加强防疫和治疗工作,国内先后向前线派出了三批专家,包括昆虫学、流行病学、病理学等等,还有数百名防疫人员,为前线提供疫病疫苗,开展消毒等工作。前线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

第二,建立全国性的卫生防疫站。从194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参照苏联的经验和办法,在解放区,尤其是工业基础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北,在原防疫大队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新的卫生防疫站。随着全国经济的恢复,尤其为了应对朝鲜战场上美国发动的细菌战,东北建立防疫站的经验和方法逐渐向全国普及。1952年底,全国已建立各级、各类卫生防疫站147个,各类专科防治所(站)188个,共有卫生防疫人员20504人,其中卫技人员19750人。^[8]

第三,颁布卫生防疫条例。1954年,卫生部颁发了《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和各级卫生防疫站组织编制规定》,这是我国卫生防疫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文件,明确规定卫生防疫站的任务。1955年6月1日,我国颁布了第一个卫生防疫法规《传染病管理办法》。随后到1964年,我国颁发了《卫生防疫站工作试行条例》。这些规定、办法和条例构成了我国防疫体系最初的法规基础。

(四)科技规划促进了卫生防疫工作的长足进步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国务院成立了规划委员会,调集了几百名各门类和学科科学家参加规划编制工作,还邀请了16位苏联各学科的科学家来华,帮助我们了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历经7个月,经过反复修改,于1956年12月,经过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颁布了《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这是我国科学技术战略性计划,它的制定拉开了我国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序幕。^{[9]6}

中国《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对卫生防疫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积极防治各种主要疾病,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生产和研制各种新的抗生素、药物、生物制品、血浆制品及其代用品……加强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整理、研究和发扬,改善环境卫生、供应合理营养、推广合理体育锻炼等方面。^{[9]40}可以看出,《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对于各种疾病的防治工作是非常重视的,并且提出要积极研制抗击传染性疫病的新药物。

在执行《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期间,我国的卫生防疫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中医学在疫病防控上的独特贡献和一些药物在治疗传染性疫病上的较高价值均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高度评价。20世纪60年代,在《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所确定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党和政府适时制定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简称《十年科技规划》),这也是我国制定的第二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十年科技规划》尽管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但是在卫生防疫领域,尤其在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防治主要疾病和计划生育等重要科学技术问题上,取得显著成绩。

在新中国原有卫生防疫的基础上,经过朝鲜战争的发酵,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比较早地站在了“保家卫国”的政治高度上,从而得到了重视。我国的卫生防疫工作在两个科技规划的指引下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一方面促使我国卫生防疫网络基本成型,另一方面积累了新中国头30年卫生防疫工作的基本经验。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新中国头30年的卫生防疫经验是一种同现代医学“以治疗为本”不同的另一种思路,那就是通过全民预防、群防群控、大规模的健康教育、爱国卫生运动,把群众运动和医疗卫生服务结合起来。^[1]这种高度集中的社会组织手段降低了专业性的成本和技术的投入。另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加强医学基础科学的科研工作,尤其是当我们见证了科技规划对于防疫工作的促进作用之后,更应该加强卫生防疫的科学研究工作,尊重科学,尊重防疫规律。

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卫生防疫体系的转变与健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发展经济跳出“贫困陷阱”和战胜疫病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效。同时,中国卫生防疫体系逐步在完善,并且经历了两次较为明显的演变。

(一)从单一的卫生防疫向全面的疾病防控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对卫生防疫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传统的单一卫生防疫工作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于全方位的、多领域的公共卫生安全的需求。因此,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党和政府启动的医药卫生领域的体制改革,传统卫生防疫体系随即从指导方针、机构建设、管理条例等多方面都发生了转变。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了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传统的单一卫生防疫事业被纳入到更宽泛的公共卫生工作里面。相应的,在机构功能、管理体系等方面也开始从传统的单一应对传染病的机构向更全面的卫生疾控领域拓展。1994年,卫生防疫站更名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疾控中心”),其职能和业务都发生了跨越性转变。这些都为一个崭新的、全方位的、多领域的新时期卫生防疫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但是,这一时期政府着重发展经济而导致卫生防疫工作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在无形中形成了“重治疗轻预防”的逻辑。计划经济时代,卫生防疫工作的经费完全由政府拨款。20世纪80年代以后,政府拨款比例开始下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经济发展迈入快车道,而

政府在卫生防疫工作中的经费投入却增加缓慢,导致卫生防疫工作落后了。政府经费投入不足客观上导致了卫生防疫资源配置不合理、分配不均衡。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政府经费的投资偏向使本来就有限的卫生防疫资源绝大多数分配到城市,防疫力量本来就薄弱的农村、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及边疆地区仍然缺少基本的防疫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重大传染性疾病的不可预测客观上促进了这一时期疾控工作的完善。从全球视野来看,这一时期传染病的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医学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应对传统传染病的方法有了很大进步,并且相继控制住如鼠疫、霍乱、天花、白喉、猩红热、疟疾、甲型流感等传染病;另一方面,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世界环境发生着深刻改变,全球范围内新出现的传染病有增加趋势且传统传染病也发生了病变,这些都对人类健康造成了巨大伤害。

进入21世纪之后,生产力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和发展,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与之相伴的是越来越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越来越难以掌控的疫病。而疫病的爆发越来越趋于人口密集、城市化水平高、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之间。同时,随着交通的日渐发达,全球化的人口流量增加,导致了疫病的全球蔓延。2003年春天SARS的突然爆发和流行就充分说明这一点。

SARS危机暴露了此前中国防疫体系的一些弊病。这场危机之后,以疾控工作为核心的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性被再次提到国家安全层面讨论,数百亿的资金投入到这个领域。中国开始积极地调整、完善新的卫生防疫体系。2003年5月9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实施。2004年1月起正式启动以传染病个案报告为基础的疫情网络直报系统。同时,卫生部和部分省份还实行了疫情信息定期发布制度。我国建成并使用全国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信息平均报告时间从原来的5天缩短到4小时,卫生应急能力全面提升。^[10]2005年1月,卫生部发布《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到2006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基本完成,也意味着覆盖全国的卫生防疫体系基本形成。

(二)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身体健康逐渐成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基本期盼。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围绕人民健康这一主题擘画了新时代健康中国的蓝图,为新时代开启更及时、高效、专业的卫生防疫工作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将加强公共卫生防疫和重大传染病防控作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内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卫生健康工作重点逐渐由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转向管健康、促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巨大转变。^[11]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明确提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确定了新时代党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是“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12]^[13]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高原则。2020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将这一原则提高至国家安全的层面,即“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并指出,只有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才能切实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13]

保障人民健康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多部门的积极性。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颁布。2019年7月,《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和《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出台。这几个文件围绕人民健康擘画了新时代健康中国“路线图”,围绕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两大核心开展多项行动。2019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公布,明确指出“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健康服务。医疗卫生事业应当坚持公益性原则。”^[14]

深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爱国卫生运动,重大疫病得到有效控制,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我国常见流行性疫病得到有效控制,并且成功防范和应对了甲型 H1N1 流感、H7N9、西非埃博拉出血热等突发疫情,有力、有序、有效地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突发事件医学应急救援。^[15]我们用仅占世界 2% 的医疗卫生资源较好地解决了全世界六分之一以上人口的看病就医问题,取得了较高的健康绩效。^[16]这些健康成效的取得反过来促使科学防疫精神的实践理性越来越厚植于广大人民群众心间。相信科学、信奉科学的风气越来越浓郁。中共中央秉承“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思想,推行“健康中国战略”,逐步形成了一个机构完善、设备优良、法律健全、业务全面的专业化卫生防疫体系。为新时代更及时高效专业地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奠定了基础。例如,2013 年,在应对 H7N9 禽流感病毒的时候,疾控人员依托技术储备经过连续的科学实验,很快将病毒的全部基因密码破解,确认了病原体,并研制出检测试剂。实现了对新型病原的严密监测、迅速确认和应急反应,为政府制定防御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2018 年完成的“以防控人感染 H7N9 禽流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的科学实践项目。一方面,代表了新时代我国卫生防疫科技的水平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为我国应对新发传染病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之后,传染病信息报告系统覆盖近 7.1 万家医疗机构,系统用户超过 16 万。建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疾控机构实验室检测网络,中国疾控中心流感、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等实验室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参比实验室。中国目前已经具备了 72 小时内检测 300 余种病原体的能力。^[17]这种能力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的疫情中被发挥了出来。中国科学家第一时间完成了病毒基因测序,验明新冠病毒的“正身”,随着检测试剂盒的推出,病症不再难以识别发现,用最快的速度分离病毒毒株,为全球的疫苗研发奠定坚实的科学研究基础。单从这一点上来讲,相比 17 年前,中国在防疫体系建设方面,尤其是在卫生防疫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

三、应对流行疫病的中国经验

时下,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全球蔓延,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损失。我国经过 70 年建立起来的卫生防疫体系,在政府组织、群众动员、科学体系、传承传统、管理措施等方面总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第一,面对疫病,我们坚持重视和利用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更加强调协调发展,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政府、市场关系和人民的定位问题,探索如何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在与政府、市场关系紧密相关的社会建设方面加大了消除贫困和提高社会保障的力度,继续加强社会治理。^[18]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使本来就艰巨的任务更加艰巨,本来就严峻的形势更加严峻。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从根本上讲,不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医学问题,而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它的流行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个地区或者国家,截至目前,新冠肺炎已经迅速传播到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它不仅造成人口在短时期内的死亡,而且对全球经济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求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

第二,防控疫病,我们坚持继承和发扬科学、高效的传统防疫方法。在面对未知疫情的时候,首先应该是科学的防控,高效阻断疫情蔓延。而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传统的经验、方法可以起到非常好的阻断传播效果。具体来讲,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能够解决问题的切实管用的办法,就是科学的,也一定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促进人类社会利益发展的。^[19]首先,发挥群众力量在卫生防疫工作中的基础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防疫战斗中所取得的成绩,与我们结合本国国情创造性的提出并倡导“爱国卫生运动”分不开。这个伟大的举措在中国抗击各类疫情中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不管是 2003 年的 SARS 斗争,还是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都充分发挥了群众的作用,开展全民总动员,联防联控,收到了防控的奇效。其次,提高民众整体文化素质是防止疫病的根本

保障。疫病防控工作离不开健康教育,健康教育任重道远。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提高民众整体文化素质,尤其是战胜疫病的信心和决心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就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志愿者联防联控战“疫”的同时,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广大党员干部冲锋一线、全国各地英勇战“疫”的先进事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家国情怀、各种各样的国际救助以及白衣天使治病救人等诸多光辉影像通过无线网络、手机、电视等媒体在群众中滚动传播。人们更加相信科学,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正规的医院才能治病救人。对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查明病毒来源、传染源和传播途径,是重中之重;研发疫苗和药品,则是长远、治本之策;宣讲普及科学防护知识,增强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生活能力,是科学防治的重要社会基础与保障,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力量源泉。

第三,面对疫病舆情舆论,我们坚持信赖“总医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见证了全媒体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巨大作用。如何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掌控和引导工作,是疫情期间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而对于专业性极强的全民防控工作,一个“主心骨”式的“总医官”的发言总是最专业的,同时又是最具影响力的。在抗击 SARS 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众多医学科技工作者相继走入人们的视野,因为其专业性、科学性和权威性,逐渐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战“疫”的“总医官”。通过全媒体向广大人民群众发出战“疫”最强音,让科学的管理和防疫措施在全民联防联控的实践中传播,起到了事半功倍的出奇效果。

第四,应对全人类共同的疫病威胁,我们坚持疫病防控的全球化合作。传染病防控问题已经被置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与法律的大背景下,成为全球卫生治理问题。^[20]全球化加剧了传染病的传播,健康价值越来越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追求。

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加入世界卫生组织,随后在众多公共卫生领域都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友好国家加强联系,为世界公共卫生作出了一定贡献。2003 年以来,中国政府吸取 SARS 的经验与教训,积极开展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各项合作,找差距、补短板,在卫生防疫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13 年以来,中国积极开展公共卫生援外,参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帮助科摩罗、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等国实施消除疟疾、血吸虫等传染病防控项目,组派专家赴塞拉利昂、安哥拉、马达加斯加、圭亚那等国抗击埃博拉、黄热病、鼠疫、寨卡等重大疫情,有效遏制各类疫情蔓延。未来,传染病防控模式全球化是必然趋势。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防疫科学家有国别,防疫科学精神没有国界,面对人类共同的疫病灾难,不同国别的科学家应该团结在一起,发扬科学、科学家共有的精神,在防疫的科学实践中创造价值,为人类作出新的积极贡献。

70 多年来,随着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我国目前已经有了比较强大且较完整的防疫体系,能够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强大政府的动员力、高效市场的供给力、有序社会的调节力来应对大灾大难。即便如此,人类如何提高应对未来未知传染性疾病袭击的能力,依旧任重道远。正如麦可尼尔在《瘟疫与人》中警告的那样:“自从人类出现,传染性疾病便随之出现,什么时候人类还存在,传染病就存在。传染病过去是,而且以后也一定会是影响人类历史的一个最基础的决定因素。”^{[21]370}

参考文献

- [1]李玲,江宇.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及其现实意义[J].现代哲学,2015(5).
- [2]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编.卫生法令汇编(1)[G].北京:内部版,1951.
- [3]毛泽东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 [6]毛泽东文集(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3)[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 [8]戴志澄.中国卫生防疫体系五十年回顾——纪念卫生防疫体系建立 50 周年[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03(5).
- [9]邓楠主编.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历程 1949-2009[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 [10]姚力.从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看新中国 70 年的成就与经验[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11).
- [11]吴超.从卫生防疫到全民健康——新中国的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安全事业[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0(2).
-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二)[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3]习近平主持专家学者座谈会强调 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N].人民日报,2020-06-03.
- [14]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N].人民日报,2020-03-10.
- [15]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J].求是,2020(5).
- [16]宁吉喆.辉煌 70 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 [17]病有所医,从“看上病”到“保健康”(大数据观察·数说 40 年)——1978 年至 2017 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由 17.0 万个增至 98.7 万个[N].人民日报,2018-09-04.
- [18]武力,张林鹏.改革开放 40 年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演变[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5).
- [19]宋月红.科学防治:“中国之治”的生动实践[J].红旗文稿,2020(07).
- [20]甄雪燕.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的主要社会因素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1.
- [21][美]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The Construction and Experience of Health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System in Contemporary China

ZHANG Linpeng^{1,2}

(1.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Beijing 100006;

2.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Abstract: China's modern health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system is gradually established under the perplexity of war, poverty and epidemic diseases. In the face of the weak foundation of health work left over from the old era, under the deployment and leadership of Mao Zedong and other senior leaders of the Party and state, the whole country worked together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initially established the health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syst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health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system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China has experienced two obvious changes from single health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to comprehensiv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then to "people's health as the center". After more than 70 years of construction, we have gained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e spirit of scientific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gained rich experience, that make our health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system playing a substantial role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Keywords: Patriotic Health Campaign; Health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System; People's Health; Healthy China

责任编辑:吴祖鲲